逆寫殖民地警察視點：
日本時代臺東廳巡查鄭江水典藏公務影像分析*

謝博剛**

摘要

影像具有獨特的符號學魔力，既能讓閱讀者直觀「目擊」現場，卻也模糊了拍攝者意圖、背景脈絡以及貌似真相的影像記錄焦點；筆者援引 Erving Goffman 對於展演（performance）、前後臺（front/back stage）的分析概念，探究來自臺東鄭江水家族所保存的家族相冊。而這批影像史料，由於主人擔當日本時代執行「理蕃***」與戰後「山地警察」勤務的緣故，尚有大量 1930 年代至 1950 年代間的公務影像，讓我們得以一窺殖民時代臺灣原住民族地區警察行政實況。

藉由歷史－記憶人類學的方法，以家族戶口資料、警察檔案文獻、民間檔案史料（公文書、手稿筆記）、口述訪談、現地勘查等田野工作，由行動者視角描述居住在南中央山脈布農族領域的鄭江水家族，自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中周旋於原住民社群、華人市場與國家官僚間的歷程。並透過歷史影像故事，呈現殖民地特別行政區（蕃地）的警察官僚視野：殖民公務的前台；異鄉人雲集的後台，探索這片臺灣東南高地「最後為國家所統治的地方/中央山脈最後的自由人」。最後，藉由本次的歷史影像解析經驗，提醒原住民族所遭逢困難歷史（difficult history）的研究，實為一複雜且充滿多重行動者視角的歷史過程，後殖民情境下的逆寫（write back），需要更多的觀點而來的視角、研究材料與再現形式的投入。

關鍵詞：通事、警察、影像人類學、日本時代、布農族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

* 本文係改寫自筆者「112 年度臺灣學博碩士論文研究獎助」優等博士論文《中介著的視點：卑南溪流域布農族地區近代社會影像誌（1880-1950）及博物館再現》部分章節內容。

**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 為確保所引用歷史文獻可追溯性，且如實反映歷史時空語用的不義性，筆者擬採維持原文獻、政策用語，如「理蕃」一詞等，敬請讀者諒察，並理解這在當代實乃一錯誤的歷史名詞，不應於任何現實生活情境裡用之。

壹、前言
貳、鑲嵌入原：由通事到警察的鄭氏三代簡歷
參、公務巡查：影像視界前後臺
肆、高砂｜新國民的塑造，對於移動軌跡的規訓與控制
伍、結論：見證光影，逆讀困難歷史

壹、前言

影像相較文字，凸顯了更實質的、可觀看的和可感受的層面（胡家瑜 2020[2006]），作為西方的發明物與技藝，其特別的物理性質，藉由化學作用所凝結的光影，捕捉了人類不斷追求的至真，保留永恆，也突破了想像的圖畫，給予實證主義者一決定性的跡證。吳易叡（2012）[1]也指出，雖然視覺紀錄廣泛地被認知為歷史事實的關鍵證據，人類學者則力陳需要廣泛而深可地審視影像的內容、脈絡、內外部的敘事、影像訴諸的對象、關係網絡建立的意義，方能解決一些對於將影像視為史料待解的方法問題。本文嘗試以 Erving Goffman（1959）[2]「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展演」概念為分析架構，表達國家機器運作的基層行政官僚－日本時代是以警察為核心，如何有意識的運用影像可視化（legibility）的特質，區分執行勤務的前臺與後臺展演，規訓自我並建立一種讓人信服的形象。而這樣的形象，又如何在殖民地政治當中扮演引導、促進治理關係建構的符號與意識形態。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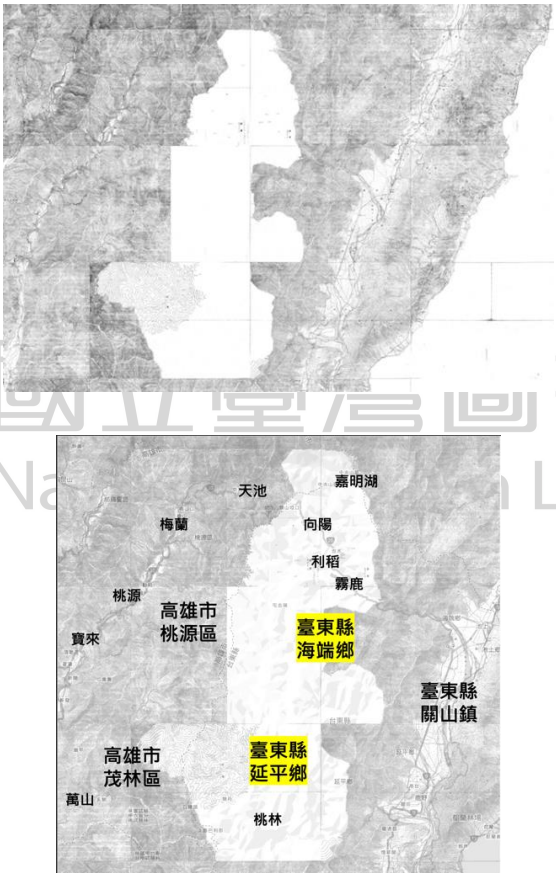
筆者以歷史人類學方法巡遊案牘史料與田野實察間，有些事總縈繞心中，久了就化為問題意識：其一即為 1916 年版本的《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維新日本以歐陸「現代國家」（modern state）治理技藝為勵精圖治的路線確立，製圖學是「以圖領政」的基礎方法，始於情報搜查假制，終於精確且實證的三角測量。20 世紀第一個十年，臺灣殖民地西部烽煙漸靖，地圖一路由平原畫到陵，朝向核心腹里－即現稱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中央高地（雪山、玉山、中央山脈）。總督府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氏體制下，殖民地經濟獨立關鍵「樟腦事業」（續為森林事業），由出口港到原產地的

---

[1] 吳易叡，〈The Missionary Gaze: The Social Biography and Archiving of Dr. David Landsborough IV's Photographic Collection.〉，《臺灣人類學刊》第 10 期第 2 卷（2012），01-57。

[2]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Woodstock, N.Y. : Overlook Press.

通道必須打開，情報、法政、軍警體系擘劃解構原住民族空間，侵犯「國中之國」代之以「國有財產」處分，並在實務裡滾動出隘勇線推進、理蕃事業五年計劃、警備道路體系、山地水田化、集團移住.....等「理蕃」行政。《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就符號學而言，幾證為國家凝視意圖，但此一視野卻突兀的出現一大塊空白於中央山脈東南段－即筆者居住所在的海端、延平布農族地區。這一片空白如何產生？又如何填滿？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圖 1：《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空白及現代地圖套疊示意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GIS 專題中心；筆者自行製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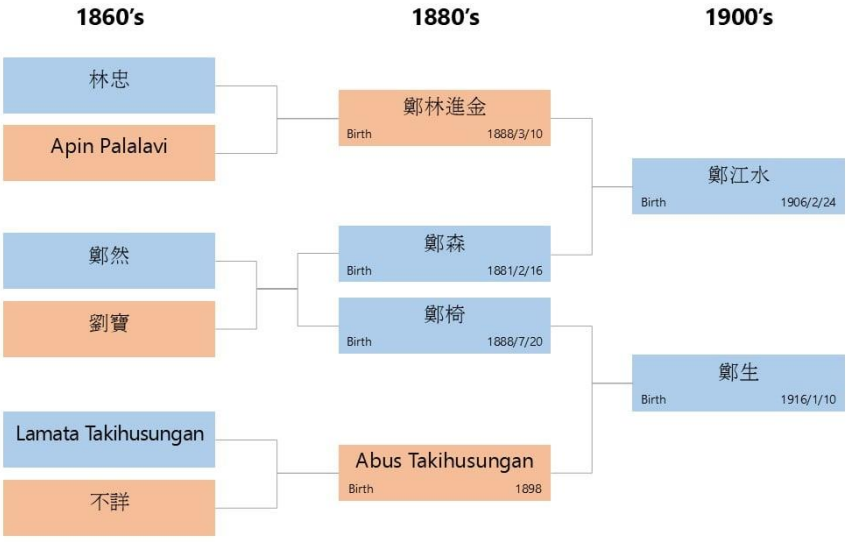
2017 年起，筆者於臺東縣海端鄉布農族文化館從事研究期間，陸續有幸接觸到地方父老的老照片。從這些昏黃斑駁的老照片中，我終於明晰地看到一張張青春洋溢、精神奕奕的臉孔——正是這些臉孔，支撐起補滿空白地圖、支撐砌石築堤開拓道路種種事業，或者果敢堅決反抗、或者為家族延續選擇噤聲、或者努力達成上級交辦任務——他們是原住民族頭人、

徵調苦力、警手巡查、流徙農民、冒險者、社商通販.....等。本文想從地方行動者的視野，藉由相片的可視化特性，描述 20 世紀初東南臺灣沿山地帶的小故事，串連這些小則故事則呼應到一個更大尺度的命題：國家化歷程。

貫穿本文故事主角是「鄭江水」，他於日本時代擔任警察，初任臺東廳里壠支廳管內蕃地內本鹿社的壽駐在所警手，歷任巡查、囑託等職務，更曾任太平洋戰爭時期高砂義勇隊的副隊長；戰後留任警務工作，專責穩固山地警政，1950 年代初即以臺灣省政府警務處巡官職退休。爬梳其人與家族史，作為華人拓墾前線的古老職業－「通事」世家，介於官府/國家與原住民族社會之間做溝通買賣、間接治理，展現出 20 世紀初這套臺灣沿山/高地政治經濟結構，逐步遭現代國家官僚治理系統取代的歷程。也凸顯「六龜里－內本鹿」這條中央山脈南部族群間互動頻繁的通道，中介者家族藉由血緣與社會文化的特質，穿梭多元族群以及不同國家政權的更迭之間，扮演區域治理結構草創時期，具有高度能動性的中介者/代理人角色。鄭先生後裔保有不少當時的老照片影像，內容包含了家族留影，以及相當比例的公務照片存檔，藉由戶口資料、鄭先生所留存的手抄公文書筆記、照片，由社會影像誌的本文形式，表達日本時代臺灣殖民地特別行政區（蕃地）基層警察官僚視點，補充先行研究裡相對欠缺的可視化材料。

國家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貳、鑲嵌入原：由通事到警察的鄭氏三代簡歷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圖 2：鄭氏家族三代示意（由左至右/男女分色）

說明：筆者自行製作，由左至右，男女分色顯示。

鄭江水先生一族三代，展現出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上半葉，由前現代社商、通事轉變成現代國家警察治理系統的具體圖像：鄭氏三代活躍於山區事業的年代，大致落於西元 1880 年代至 1950 年代間，貫穿清國、日本到戰後長官公署及臺灣省政府數政權更迭。鄭然由中國福建渡臺，於「開山撫番」背景下進入西南山區經營貿易拓墾營生；鄭森承繼貿易事業，是官方所載的內本鹿通事，也娶了具布農血緣的女性為妻，但他面對的是政權更迭，是國家秩序草創期的擺盪與衝擊，他在 1920 年代投靠體制成為「警手」，特許經營原本的跨域貿易；鄭江水，則在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政綱與治理網絡確認後，肩負政務鞏固與協調角色，戰後延續日治「理蕃」的「山地行政」，一樣肩負著為新政權提供「可視化」情報與政策建議，並努力維繫家族於冷戰格局下免於整肅。家族三代的歷史，實與臺灣原住民族近現代進入現代國家體系下的歷史息息相關，血緣與社會關係交融交錯，具有相當程度的中介及代理人位置。

一、從六龜里往來內本鹿：南中央山脈橫貫之道

故事發生的地方，是臺灣中央山脈南段的布農族領域，並由高雄荖濃溪流域的六龜里，橫跨到臺東卑南溪流域的內本鹿。兩地鄰接中央山脈南南段陷落地帶，形成雙邊族群互動通道。19 世紀中葉以前，內本鹿山區原是周邊各族群間的勢力緩衝帶，布農語 Lai-punuk 一詞所指即是：萬山人[3]，當西元 1870 年代布農人由北部的新武呂溪流域南下時，便有 Takistalan 氏族與萬山人的領袖家族建立盟約，取得土地使用權；其他各布農氏族（*siduh*），也循著山區開發的倫理，尊重先到的開創者、照顧姻親與聯盟友伴，分散於幾道分水嶺斜面適宜種植小米處，建立以家族（*lumah*）為單位的「聚集之地」（*asang*），且在與外界維持交換貿易、征戰並締約的動態平衡關係。約略同期，北方新武呂溪的布農人，再度穿越中央山脈主稜海諾南山到小關山間隘口，來到西部荖濃溪流域，並漸南進上寶來等地，讓南中央山脈最高地帶形成一以布農人為主流的領域範圍。至於海拔較低居河川中游的沿山地帶，則成為第二重族群頻繁互動的介面。若由通商貿易的墾殖冒險家角度觀之，則是由沿山地帶方便集貨輸出的據點起家，他們大多於部落娶妻生子，依附布農人的姻親互助倫理，在散居於高地的布農氏族聚落間，建立自己的貿易之網。

國家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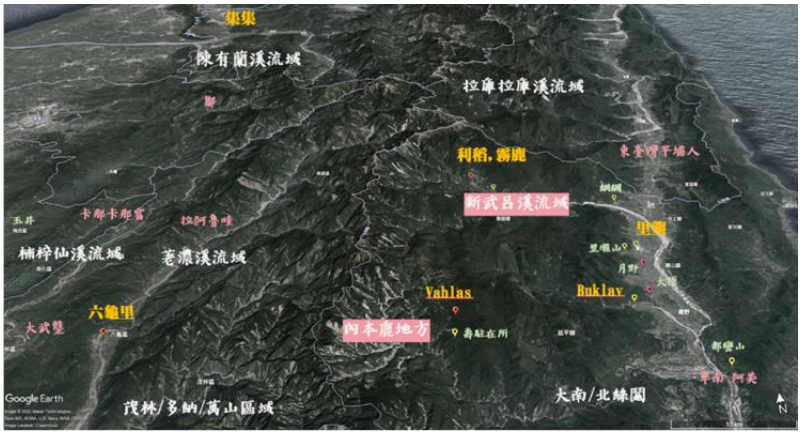


圖 3：近現代中央山脈南段族群空間關係

說明：筆者自行製作，以中央山脈東南側新武呂溪流域與內本鹿地方焦點。

[3] 過去被人類學家分類為魯凱族的下三社群，因其獨特的語言與文化認同，近年來也有倡議作為獨立民族之議。

依據總督府史料《理蕃志稿》[4]，自明治 42 年（1909）起，總督府向此發動了至少 3 次的探勘行動，目的是偵查該地域情勢、社群關係，蒐集可開發資源情報，順帶認識到這一個區域獨特的通事社群。第一次的內本鹿橫斷探勘隊，為《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繪製工作的先行觀測，指揮官為臺東廳平野治一郎，警備隊員有阿緱與臺東兩廳巡查，並請臺東廳通事鄭清貴為嚮導；成員尚包括總督府鐵路部與殖產局技士、僱傭人員，顯見其勘查道路、不明境界情勢、調查森林資源意圖。計畫由六龜里出發越過中央山脈，進入內本鹿地方後直抵大南，一行人雖順利在 12 月 11 日抵達「內本鹿社」，與地方領袖 Lastal 及通事張富祥、莊元等人會面。不料 14 日清晨，臺東廳總通事鄭清貴[5]卻持預的匕首，刺殺了指揮官平野氏與河口亥四郎警部，元兇雖旋為內本鹿人射殺，但這趟行程也嘎然而止。本次探勘證實區域內有許多漢人通事居住，布農族人生活富足能生產菸葉供銷，甚至還有鐵匠可使用風箱修理農具鐵器，而族人接獲官方餽贈時無所貪求的心境，更讓這批探險者留下深刻印象，檔案將之詮釋為領袖與通事的雙軌領導。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4]臺灣總督府警務局，〈中央山脈橫斷探險竝其ノ指揮官ノ遭難〉，《理蕃誌稿第三編上卷》1921，31-40。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施武郡蕃內本鹿社方面蕃情竝地理ノ調查〉，《理蕃誌稿第三編上卷》1921，206-218。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內本鹿社方面探險〉，《理蕃誌稿第五編》1938：297-303。

[5]根據《理蕃誌稿》敘述，乃歸因於精神錯亂或其他通事教唆所致，但無從考究。不過如綜合其他撫墾署資料來看，明治 30 年（1897）鄭清貴於馬蘭社擔任該社通事，馬蘭社是臺東平原古老的大社，明治 29 年（1896）與初登陸的日軍關係融洽，聯軍擊滅清軍殘部，鄭總通事更擔任聯軍的顧問職。明治 31 年（1898）臺東廳下區分街庄，鄭清貴復長期擔任「第四區」（鹿野）區長，長期與日方友好並具官方代理人，忽然間「精神錯亂」刺殺臺東廳警務課主官，著實有所蹊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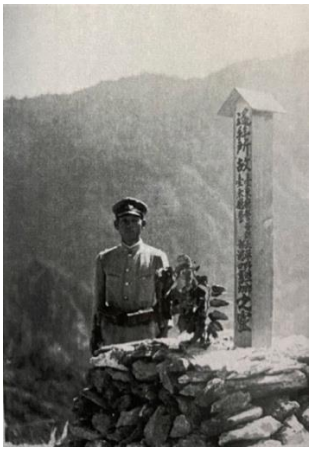


圖 4：內本鹿警備線故平野治一郎遙拜所

資料來源：毛利之俊（1933）。

第二次內本鹿探勘於明治 44 年（1911）發動，第五任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令阿緱廳長佐藤謙太郎組織探勘隊，以阿緱廳蕃務課警部今澤正秋、六龜里支廳支廳長岡本哲仁，與該廳警部補、巡查等人，協同總督府蕃務本署蕃務課警部池田鳴遠、調查課勤務技手齊藤武彥，自 4 月 28 日由六龜里出發，預計 5 月 15 日返回。4 月 29 日調查隊抵達 Palisan 社蕃務官吏駐在所，該社族人與通事柯知[6]及內本鹿社的「鄭椅」等人迎接，其中鄭椅即鄭森胞弟。5 月 3 日內本鹿社領袖 Lastal 再率壯丁前來迎接，往後數日調查隊進行地形觀測，並居住在不同聚落的通事家中，直到 5 月 9 日聞臺東廳局勢不穩[7]而撤回六龜里。本次勘查最重要的情報是釐清內本鹿人的對外關係情勢與通事貿易網絡。報告書[8]中詳實紀錄散居於各聚落間 12 名漢人「通事」，是族人對外貿易主要管道，對外輸出主要是鹿茸、鹿鞭、獵獲物與金線蓮等藥材，輸入火藥、槍枝等。報告書還提到，由於地方的貿易量與數額讓通事們獲益匪淺，戰爭衝突往往會造成其行商風險，所以可能會遊說操控部落以維護其利益。其內文甚指該社以「頭目－通事－壯丁」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6 其人於 4 年後因涉及六龜里事件而遭官方殺害。

7 約略同時蕃務本署囑託志田梅太郎出發往新武呂溪、北絲闥方向，進行《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細部測量工作，但調查隊卻於 6 月 12 日清晨於新武呂溪最上游的 Bacingul 社（摩天）附近遭襲，留下前述《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的空白。

8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施武郡蕃內本鹿社方面蕃情竝地理ノ調查〉，《理蕃誌稿第三編上卷》1921，206-218。

三個「階級[9]」,「頭目」是土地持有者,「通事」供給勢力影響範圍內的族人日用品,「壯丁」則為開墾土地的業主。

第三次探勘則在 10 年後，區域情勢產生變化後才得發動。這因東臺灣布農地區自大正 3 年（1914）霧鹿事件後局勢始終不穩，加之大分事件（1915）及其餘波，日方改採通電鐵條網進行貿易禁絕，復以開拓橫貫警備線，配合軍、警、航空班威懾，與重點人物協商談判，取得區域主導權。大正 11 年（1922）11 月 12 日，今澤正秋警務課長組隊入山，由於內本鹿地帶已改隸臺東廳，探勘隊的成員皆為臺東廳警務人員，與原住民協作 60 人編成大規模探勘隊。這趟探勘改由臺東廳下ボクラブ警戒所（Buklav）出發，由鄭森接應循鹿寮溪上溯，在內本鹿各地進行探勘。

表 1：三次內本鹿探勘行動大要

年代	路線	指揮官	成果	情報
明治 42 年 1909.12.6-18	原訂：六龜里-內本鹿-大南-卑南	臺東廳警部平野治一郎	平野治一郎與河口亥四郎遭殺害，而撤回六龜里。	通事共 9 人。頭目 Lastal 及通事影響力深遠，因通事數量多，日用品、火藥不匱乏，對於餽贈禮物無特別反應。
明治 44 年 1911.4.21-5.15	六龜里-內本鹿-六龜里	阿緱廳蕃務課長今澤正秋	原訂由臺東廳方面出山，但因區域情勢	通事共 12 人。將內本鹿區分為三個階級：頭目、通事與壯丁，通事為與外界的中間人，地位次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9] 筆者認為日本人受當地布農人與萬山人接觸、聯姻而產生的物質文化符號採借，以及往來穿梭的外來社商影響，將內本鹿地方布農人比做具臺灣南部排灣族、魯凱族式的階序型/階級化社會（hierarchical society）。警察的外部觀點，或許也反應當時暢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將階序型社會當作較「進步文明」的社會類型，而把內本鹿地方描述為不同於其他布農地區，更易為日本政府以間接方式收編，是一份具政治遊說企圖的報告內容。但筆者認為光以符號採借就符合人類學「階序化社會」的定義，顯需再詳究考察。「頭目-通事-壯丁」作為社會階級，其社會結構再生產的原則為何？或僅是功能性的職業分化？通事社商家族，在特定時空轉換背景，確有其政治經濟影響力，但也未形成差序，仍呈現「個人以後天努力實踐取得成就」的平權社會特色，後裔日後陸續成為布農族人一份子，當代產生 Mai-put（曾為漢人）的家族認同，而那些承襲自先祖的華人式名字，不少也融入到當代布農名庫之中。是以筆者對於將內本鹿地方視為布農社會中心化/階序型社會的案例，抱持著保留意見。

年代	路線	指揮官	成果	情報
			不穩，而撤回六龜里。	於頭目，備受信任。
大正 11 年 1922.11.12-20	臺東廳 Bulakv（武陵）-內本鹿-大南	臺東廳警務課長今澤正秋	過程平順，宣稱探勘結果豐碩。	通事過去協助部落族人對外自由貿易，多已在山區落地深根，輸出獵獲物、山產，再輸入火藥等物資，循環積累影響力大。但六龜里事件後貿易管道受到封鎖，可操縱用於區域治理，但需移住部分有危險性人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18）、（1932）。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二、由內本鹿社變成延平鄉：中介者的影響力

大正 10 年（1921），臺東廳的ボクラブ交易所（Buklav）附近，曾發生一起值勤巡查小宮房吉遭殺害的事件[10]。隔年 1 月份，Qaluqalaz 社、內本鹿的 Madaipulan 社、Tansiki 社、Vahlas 社、Bacingul 社領袖連袂來到警戒所，交出前一年襲擊事件擄獲的槍枝；10 日後，再由鄭森與其長男鄭江水帶領上述人員再來到警戒所，歸還被殺害的小宮巡查首級與其餘槍枝[11]。由此一紀錄來看，再加上當年的第三回探勘時的種種協力嚮導，內本鹿社內的政治頭人與通事群，經歷了 10 餘年的試探，與日本殖民政權持續接洽互動，讓區域貿易與政治勢力達到均衡穩定。

大正 12 年（1923）2 月，探勘行程結束後三個月，來自於內本鹿 Vahlas 社的鄭森一族 11 人與 Pis-padan 社張富祥一族 12 人，正式遷居ボクラブ

[10]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ボクラブ」ノ蕃害〉，《理蕃誌稿第五編》1938，66-67。
[11]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內本鹿社蕃人銃器及首級提出〉，《理蕃誌稿第五編》1938，238-239。

警戒所（Buklav），鄭森還接下交易所的生意，是官方所認可的私營交換業者，只是不久全臺交易所都為警察機關收回，鄭森則改任警手。約略昭和 3 年（1928）由此處退休，轉居於月野（關山鎮月眉里）、里壠街等地，並開始土地開墾實業工作。鄭森最終於昭和 19 年（1944），在幾縱橫整個日本時代後逝世，享壽 73 歲[12]。

圖 5：與內本鹿「總頭目」Lastal 一家合影的鄭江水

說明：推論右圖為 1920 年代末。

影像來源：瀨川孝吉/湯淺浩史（圖左）；胡鄭德來授權使用（圖右；2025/6/1）。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今澤正秋的探勘報告（1922）[13]曾指出內本鹿布農人遷徙源流，是因總頭目 Lastal 常來此打獵，而與萬山社領袖家族立下盟約，納租居住。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教室的《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1935）報告，馬淵東一更明確指出內本鹿地方直到 19 世紀中葉，才有新武呂溪支流大崙溪的 Laklak 社（轆轆）方面，郡社群的 Takis-talan 及 Is-lituan 氏族族人遷入 Vahlas（布農語為「河畔」，鄭森一家正居住於此地），前者給予萬山的頭目家系租約，包括火槍、黃銅鍋、鐵鍋、鐮刀、斧頭、刀與豬等贈禮交換得以居住的土地，而前面一直提及的 Lastal 正是 Takis-talan 家族領袖，由此具有對於其氏族及姻親、盟友的影響力，基於 Takis-talan 先占的優勢地位，日本人便視為內本鹿社「總頭目」。組圖 5 左即為 Lastal 穿著其著名的雲豹毛皮背心，地面則擺滿象徵財富的鐵鍋；圖右則為鄭江水與其一家

[12] 地方口碑相傳，戰後鄭江水為紀念其父，而取與「延平郡王」鄭成功本名「鄭森」同名的典故，將關山郡內本鹿社改隸為延平鄉。

[13]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內本鹿社方面探險〉，《理蕃誌稿第五編》1938，297-303。

共同合影，左二著警手制服者為鄭江水。由前文可知，鄭森在大正 11 年（1922）偕 Lastal 到警戒所送還日警首級，於是透過史料檔案可以看到三方合作關係：「通事」鄭森與其子鄭江水，「傳統領袖」Lastal 及其子 Salizan（Ubak）都進入臺灣總督府的地方治理代理人行列，除鄭江水在戰後的山地警務曾具有相當影響力，Salizan（Ubak）成為內本鹿青年團團長，戰後更以漢名「胡元貞」被官派為第一屆與第二屆延平鄉鄉長。

就大時代經緯而言，鄭氏三代人故事具體而微臺灣在世界史架構下的命運，位處於多元族群互動、多重外部勢力交雜、帝國主義外來政權的競逐地帶，即便以往被視為內陸偏遠的中央山脈高地，同受牽動交織內外力量於每一日常生活。

參、 公務巡查：影像視界前後臺

圖 6：昇任巡查紀念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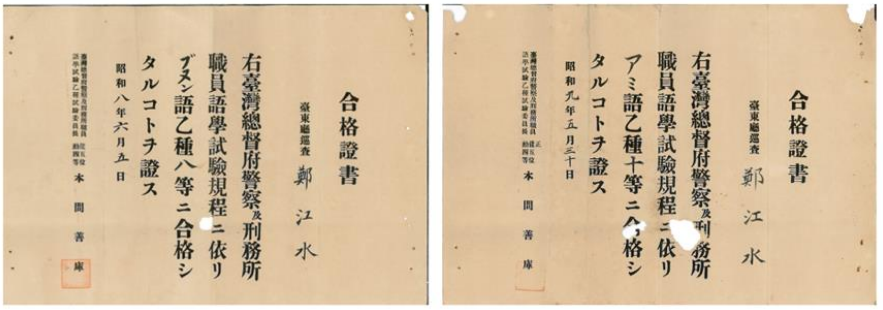
說明：推論為 1930 年代初。

資料來源：胡鄭德來授權使用（2025/6/1）。

鄭江水為鄭森之長男，明治 39 年（1906）2 月 24 日出生，戶口調查

簿種族別為「福」[14]。據戶口調查簿的寄留資料顯示，鄭江水於昭和 3 年（1928）以「警手」身份登記於內本鹿社「壽」一番戶，即為日本蕃地警網裡頭的「壽駐在所」，可以視為其警察生涯開端，同年他與 Halimurun 社 1 番戶 Biung 的三女 Inkaban 結婚，為其第二任妻子[15]。昭和 5 年（1930）升任巡查後，續於「壽」服勤。壽是內本鹿警備道的據點式駐在所，而此地也被規劃作為內本鹿社的行政中心；昭和 10 年（1935）再度轉寄留至里壟 3 番戶，然而本籍則隨父親鄭森一戶遷入里壠街上的 5X-X 番戶。

一、中介者的通譯勤務生涯


合格證書
臺東廳巡査 鄭江水
右臺灣總督府警察及刑務所職員語學試驗規程ニ依リアミ語乙種十等ニ合格シタルコトヲ證ス
昭和九年五月三十日
本間善庫

合格證書
臺東廳巡査 鄭江水
右臺灣總督府警察及刑務所職員語學試驗規程ニ依リブヌン語乙種八等ニ合格シタルコトヲ證ス
昭和八年六月五日
本間善庫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圖 7：語言考試合格證書

說明：於 1934/1935 年頒發。

資料來源：胡鄭德來授權使用（2025/6/1）。

據其所屬履歷檔案，他在昭和 8 年與 9 年（1933, 1934）分別通過布農語及阿美語考試「警察及監獄職員語言試驗規程」。石丸雅邦（2011）曾對此「通譯兼掌」制度進行過研究，警察人員在通過「蕃語通譯兼掌權衡」後，可任命為「兼掌通譯」的職務兼任，並且領取月薪加給「手當」（津貼）。此制始於明治 31 年（1898）4 月，為鼓勵日籍警察於公務中使用本島語言，所發佈加給行政條例；明治 34 年（1901）又為了促進臺籍警務人員的日語能力，也將加給範圍適用於他們身上，由此這一個制度實為一雙向殖民治理語言能力政策。昭和 8 年（1933）通過上述原住民族語言考試的鄭江水，

[14] 為福佬人，但也有可能是說福佬話的其他族群。

[15] 鄭江水一生常為人所樂道是曾娶四位妻子，暗示其家業殷實，但其實是接連病故，並非一次娶了四房，或不斷地納妾，而在其四任妻子當中，有三位便是來自內本鹿的布農女性。

係依據為大正 11 年（1922）11 月的「警察及監獄職員語言試驗規程」，依據合格證書格式，他所參與為由廳長擔當試驗委員長的乙種試驗。其首先是「乙種 8 等」布農語合格，按前述試驗規程，乙種 8 等為最高等第，如獲長官推薦可視同甲種資格。隔年通過乙種 10 等的阿美語合格，雖然僅是最低的 10 等資格，但可合併先前考試，讓其兼掌職務再升一級。就口述與檔案比對下，鄭氏至少擔任過大關山事件（1932）與內本鹿事件（1942）的調查通譯，再就其家庭背景而言，絕不僅透過資歷審查取得形式化資格，他真的能使用流利的布農語協調於人際之間，受當局所用而經辦「理蕃」外勤業務。

圖 8：里壠支廳ブルブル蕃語講習終了式紀念

說明：推論為 1930 年代初。

資料來源：胡鄭德來授權使用（2025/6/1）。

鄭氏於昭和 16 年（1941）曾任臺東廳關山郡警察課「囑託」[16]一職；而其家屬所保存的，昭和 17 年（1942）更名「平山江一郎」的職務名片所載仍為「臺東廳巡查」，不過依黑澤隆朝（1943）來關山郡進行民族音樂調查時，在其田野日記裡頭註記協助其田野調查者，為吉丸留夫巡查與平山江一郎，平山氏調度召集一切田野調查事宜，然黑澤卻未特別紀錄其官職，或許當時鄭江水已非警務職員。有地方傳聞指出他終戰前已升任掌管原住民地區的「蕃務課長」，然此一職位皆以日籍且具警部資格者任用，就其戰

16 「囑託」不同於巡查、巡查部長、警部等正式編制，係為「委任」的約僱性質，彈性更大、薪水也較高。

後銜接留用為「警員」對照，終戰時應為「巡查」職等，因此是否破格錄用？或為職務代理？目前尚無更進一步的佐證。不過可以確知的是，戰爭白熱化期間更名的「平山江一郎」，民國 35 年（1946）再改回鄭江水，並且持續擔任警察工作，維持冷戰格局下的原住民族地區穩定。

本文初衷，除描繪一通事家族在近代的歷史圖像，更在意如何解析鄭江水所傳世的老照片。有一數量不少也不易解譯的主題系列：巡視。內容雖未必反映地方重大事件，但由其反覆不斷的出現、大致雷同的構圖技巧，宛如一攝影文類。這些因為廳長或支廳長的「巡視」而留下的紀念寫真，放回其原有歷史脈絡裡頭，會呈現出何種視角？反覆考證影像發生的時空、地點及考究推論人物背景履歷，原來影中人的交會，正是一群來自四面八方的異鄉人，因殖民地政治/社會秩序的建立與監視的意圖，齊聚到這顆攝影鏡頭下。本研究討論國家的可視化工程，透過調查、研究，篩選聚焦了治理的藍圖，「巡視」主題前臺看似在驗證治理秩序的建立，卻也顯現且再現這群殖民代理人的後臺身影，筆者想從這批因歷史久遠而趨於同質的「蕃地警備員」臉孔裡，辨識其中的個人精神。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二、檢閱殖民穿越線：本間善庫的《臺灣中央山脈之歌》

臺東廳長本間善庫任職期間（1933.2.2 -1935.8.21），曾巡視全線通行不久，可由縱谷平地一路循警備規格道路進入中央山脈最深處的：關山越警備線。本間氏出身福島縣，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科畢業後任愛知縣警視，渡臺後歷任臺灣總督府警視、臺中與臺北的警務部長、內務局長、澎湖廳長與臺東廳長，不僅初任官便是高階警務人員，且頗富文采，是著名的「理蕃文學」作家，昭和 9 年（1934）刊載於《理蕃之友》〈臺灣中央山脈之歌〉[17]便是其巡視過後之心得：

[17] 本間善庫，〈臺灣中央山脈の歌〉，《理蕃の友》，第三年八月號（1934 年 8 月），8。

東亞重鎮日之本　南盡天涯成砦城
莊嚴之島喚蓬萊　常磐久長綠深深
物產豐饒之天地　貫穿南北一百里
大山大脈並群巔　越萬尺者五十餘
群雄競逐姿態顯　於茲乃現見偉大
太平洋出朝日升　直指高高上雲表
西支那海落明月　遙遙送別於足下
大風起兮向天嘯　對谷吐納息湧雲
千古森林還身入　紅葉石楠花鋪陳
澗水川行淌瀑音　於茲乃現見姿尊
任天風吹掃亂雲　祓禊潔淨若男兒
恃憑遠塵寰山靈　甦生此老去蒼魂
領受神示而厥醒　掬取源源力泉生
滿滿汚濁人世間　吹入聖潔之皇命
應率萬邦國民　盍歸乎來

本間善庫原作；謝博剛試譯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圖 9：巡視マテングル砲台（Bacingul）

說明：推論為 1932 至 1935 年間。

資料來源：胡鄭德來授權使用（2025/6/1）。

他究竟看到了什麼樣的風景？圖 9 可能給予我們視覺化的想像。經現場實察，拍攝地點位於新武呂溪上游視野最佳、展望最寬闊的制高點：Bacingul 社附近，即今日南橫公路的「摩天」地區，志田梅太郎於明治 44 年（1911）進行細部測繪時即殞命於此。後方山嶺腰際穿越的道路，即警備線本體，其間據點為今日公路「道班房」所在，當時為附設教育所機構的マテングル駐在所（Bacingul）。由該處向高處攀登，即為砲臺所在地。筆者實際到遺址現場取得 GPS 資訊後套疊地理資訊系統進行視域分析，確證火力範圍幾乎可以涵蓋新武呂溪最上游各地，包括北方 Ta-tahun、Supadanan、Haimus、Hahaul 等屬於 Palalavi 與 Isnangkuan 等氏族的範圍，以及南面 Mas-bul、Halipusung、Maihuma 等屬於 Takiludun 與 Ismahasan 等氏族領域範圍，與東面的 Pahas 屬於 Lavalian 氏族的空間；從而與新武呂溪中游的ブルブル砲臺（Bulbul/霧鹿）射程形成交叉火網。依《理蕃之友》警察通訊雜誌所述，至少於第二次逢坂事件（1934）發生時，曾實際發炮威嚇布拉克桑山地區族人。

國立臺灣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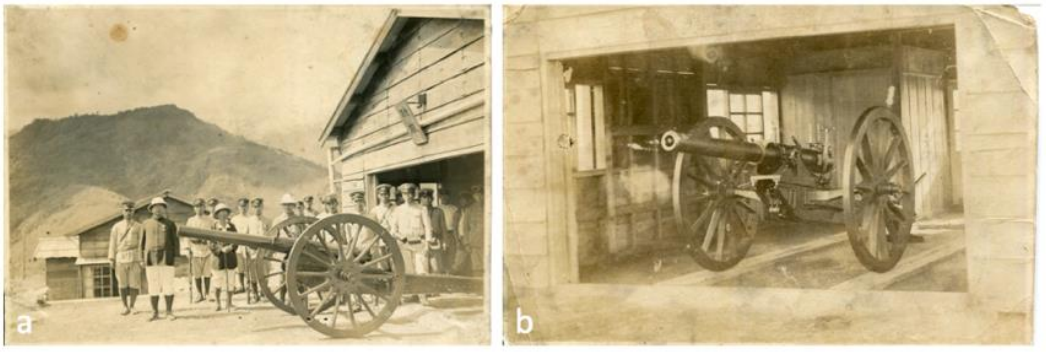


圖 10：マテングル砲台（Bacingul）配置

說明：推論為 1932 至 1935 年間。

資料來源：胡鄭德來授權使用（2025/6/1）。

組圖 10 則是本間廳長至マテングル砲臺（Bacingul）巡視。左圖可見得營舍、軍械室等構造，三吋速射砲已由砲廠推出，於陣地隨射擊目標範圍調整方位。右圖則為該砲存放於砲廠內態勢，地面有兩條水泥構造軌作承重基礎。主砲為總督府編制內 Putilov M1900 三吋速射野戰砲（76-мм пушка образца 1900 года）之一。源出俄羅斯聖彼得堡 Putilov 兵工廠，1900 年至 1903 年間打造，係日俄戰爭為日軍所擄獲的戰利品。根據林一宏（2019）

[18]的研究，當時日本軍方曾應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請求，撥付 6 門三吋速射砲予總督府，作為征伐原住民族地區使用。1914 年太魯閣戰役後又轉送至東臺灣地區，其中至少有 3 門經常性配備於關山越警備道路上的 3 座砲臺陣地[19]，現存 2 門為海端鄉公所集中安置於「霧鹿砲台公園」。當時砲臺標準配備，除這門三吋速射野戰砲外，還包括了七珊山砲、十二拇臼砲（珊/拇皆為口徑尺寸，臼砲為迫擊砲）與班用機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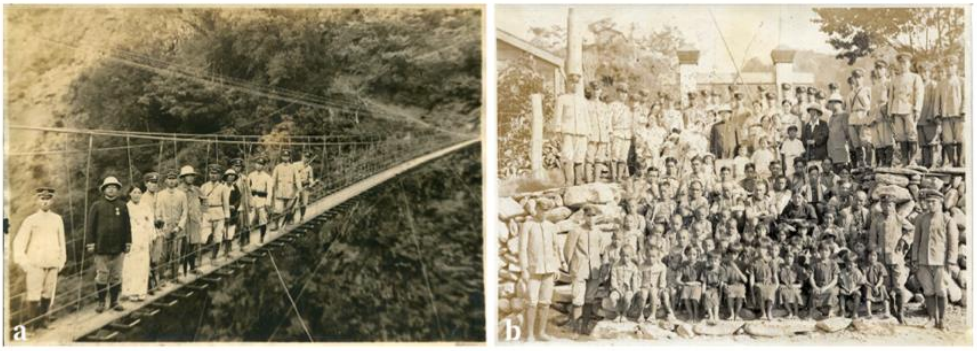


圖 11：天龍鐵線橋與ブルブル駐在所（Bulbul/霧鹿）

說明：推論為 1932 至 1935 年間。

資料來源：胡鄭德來授權使用（2025/6/1）。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本間氏所巡視者，實為一套新建立於當地的統治體系，以警備道路為「穿越線」，沿線所設置的警察據點、機關與附屬設施構築了「點位」，並藉駐在所組成的「監視區」、砲臺火力射線與警察航空班的飛行，形成了「面」的山區壓制網絡。組圖 11 地點是警備線上一級據點——ブルブル駐在所（Bulbul/霧鹿），而此地同為布農人由花蓮南遷進入臺東最重要的古老大社。圖左鐵線橋名喚「天龍」，是里壠支廳長冨永藤平氏於昭和 3 年（1928）建成時命名，橋旁設置ブルブル溪見張所（Bulbul/霧鹿），是警備線穿霧鹿臺地後，越過新武呂溪向更上游通行的管制站。圖右則是駐在所前[20]，背景高地可見此地砲廠建築；至於影像語言場面調度，則以充滿家

---

[18] 林一宏，〈國立臺灣博物館藏三吋速射野戰砲之考證〉，臺灣博物第 142 卷第 38 期（2019），48-55。

[19] 流域的第三座砲臺，則位於新武呂溪與大崙溪流域匯流口的サクサク高地（Saksak），火力範圍銜接霧鹿砲臺，籠罩新武呂溪下游兩岸；現址於新武部落對岸，戰後設有林務局瞭望塔。

[20] 現址為海端鄉霧鹿國小，為部落中軸線底端，貫穿整個霧鹿臺地。不過日治時期的

父長制意味的本間廳長為中核，警備員包圍畫面中央的霧鹿族人依長幼依序排列，形成高度的帝國凝視感。

三、異鄉人的雲集：殖民官僚影像前後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圖 12：部落巡查「前台」畫面

說明：推論為 1935 至 1936 年間。

資料來源：胡鄭德來授權使用（2025/6/1）。

類似主題的照片尚有幾任里壠地區支廳長、郡守的巡查照片。除顯示鄭江水氏作為通譯陪同外勤巡視外，同樣視覺化了當時的警察機關配置，與各種「前後臺」畫面。組圖 12 為出身鹿兒島的古藤齊助支廳長一系列部落巡查寫真，以場面調度與凝視點再現了具差序的社會關係。圖 a 可能為鄰近支廳所在的里壠山社，畫面中布農領袖所居住的房子是所謂「改良式家屋」，妻兒所穿著的則是素淨的洋裁服和日式兒童浴衣。據警察雜誌《理蕃之友》昭和 7 年（1932）9 月號的報導〈蕃人製材講習〉，該社的奧田警手召集社內十餘名青年，進行改良式家屋的建造講習，並持續推廣這類以日式工法（包括製材、工具使用、儀禮）建成的家屋，取代布農族原有基

族人家屋卻非現址，經過 1930 年代的集團移住，鄰近氏族聚落的家屋齊聚於臺地南側的山腹鄰接處，警備道穿越駐在所前；是 1970 年代聚落空間重新更新規劃後，才沿著該中軸線設置建地形成棋盤格現狀。

於防禦而不設窗戶、順應急坡地形的家屋形式，以及與家屋結合一起的信仰觀念（比如室內葬），由此來看支廳長的巡視，便具有一種檢閱「內地化」與「文明化」的意味。圖 b 是內本鹿越警備線上的清水駐在所；圖 c 則為ブルブル駐在所（Bulbul/霧鹿）；圖 d 雖然無法確切知悉所在地，但由裡頭的人物可知是內本鹿地方的族人。這 4 張照片裡頭有著共同的殖民視角：除里壠山的改良家屋本身外，清水（Mamahav）一帶是日本人針對內本鹿族人集團移住往下游的中繼站與分界點。霧鹿駐在所上空懸掛著超高的日本國旗；第四張內本鹿越道路上，警方全副武裝手持著槍械，後方則魚貫的成年族人們。呼應這些語言符號的，則是四幅影像裡頭族人神情一致的漠然或凝重，及作為殖民主官彰顯的威儀。

圖 13：長官視導慰問紀念寫真

說明：推論為 1930 年代。

資料來源：胡鄭德來授權使用（2025/6/1）。

組圖 13 則由一系列對內視導慰問主題照片所構成。有海拔顯然非常高的高地駐在所、有圍繞著刺絲網充滿肅殺感的據點（附近可能暗藏有地雷等警備附屬設施）、有看起來像是支廳長官舍，顯然更為寬闊典雅、也有難得一見位於森林之中的駐在所，看似和平的陽光從樹影間灑落（通常為了防禦需求，需要淨空視野）；至於是哪些活動，搭配檔案與回憶錄閱讀，則包括官方例行的巡視、新任長官視導、業務督導或訓勉，又或者是日本新年的拜訪儀典。這些影像依循公式拍攝，以主官為核心，駐在所內職員妻兒坐在第一排，職員們間未有明顯的階級之分，散在後方站立。從多半單身赴任或者孩子都還很小的情況來看，警備員的平均年齡應當很輕，頗符合家鄉學校畢業後，赴遠方謀生立業的初立年紀。

如果公務景象如組圖 12 是一種舞臺前的「展演」，警備員、官僚扮演著帝國殖民地代表的角色，位於完全人生地不熟、語言不通、文化與社會慣習也迥異於家鄉的所在，必須兼具殖民鞏固的儀態威嚇，及「撫育開化」的啟發者角色，但在組圖 13 的那一刻，抱著小孩的、歪頭打哈欠的、對著鏡頭耍帥的、漠然放空的，豐富的神情展現了他們「作為人，而非國家機器」的本質。影像凝視的主位，由國家審查之眼，變成行動者自己，這兩組長官巡視影像對比，一直帶給筆者這樣的感想：對於從遙遠日本內地而來，或至少是非在地（就臺灣籍巡查、警手而言）警備員而言，影像象徵著「遠行者」齊聚的留念，因殖民地經營，齊聚異質化的人們到另一個遙遠的地方，管理從來不在生命經驗裡出現的人，猶如離散在故鄉之外的飛地一般。這樣留下的凝視，是誰的視野？恐怕還是殖民治理的國家視野外，屬於異鄉人的眼光。

肆、高砂｜新國民的塑造，對於移動軌跡的規訓與控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昭和 6 年（1931），總督府頒布新的《理蕃政策大綱》，確立以「教化」為主旨的政策原則，以「內地化」作為文明開化的路徑，藉由其文化種族主義濾鏡，設立程度量表，比如採行定耕、住改良式家屋、改穿日式國民服裝（或洋服）、變更為日式名制、改革 *masamu*（禁婚範圍）慣俗、說日語、舉辦神前婚禮.....等等，由經濟基礎結構、社會組成原則，乃至於精神上的意識形態，成為帝國治下的「高砂族」。駐在所裡頭的警察，由擔任社會秩序維護、制壓反抗的警備員，增加了「撫育教化」斜槓身份。而鄭江水所留世的相片，適切地補足了文字史料與口述歷史的抽象畫面，筆者以教育系統、青年團組織與高砂族挺身報國隊的戰地寫真，作為描述新國民性的塑造，焦點在於對於人群移動軌跡的規訓與控制。

一、教育背後的身體規訓：農業講習、修學旅行與陸上競技

圖 14：ハイトトワン農業講習所（Haitutuan/海端）與學生勞動

說明：圖 a 為 1943 年，其它推論為同時期。

資料來源：胡鄭德來授權使用（2025/6/1）。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去日本學校，老師都一直帶著我們去種田」曾有幾次機會訪問 85 歲以上耆老，一同由記憶之河捕撈他們青春少年時的回憶碎片，總是記得那樣的身體勞動感。組圖 14 是位於今天海端鄉公所附近的ハイトトワン農業講習所（Haitutuan/海端），據 75 歲以上耆老回憶，這一帶除了鄉公所、火車站、衛生所、海端國小等機關外，一大片都是「山地農校」的耕作地，戰後所稱的「山地農校」前身即為農業講習所，是雲集各「蕃童教育所」所選派子弟為「先覺者」的搖籃，培訓忠良於國家的定耕農民，以「授產」鞏固「理蕃成果」，讓經濟系統的完全變革達成社會整體的改造－「選擇性的同化政策」。圖 a 是昭和 18 年（1943）農業講習所第 7 回與第 8 回生的紀念留影，地點大致為今日的海端國小，因已進入二次世界大戰總力戰階段，學生們穿著猶如日本軍裝的國民服。圖 c 與圖 d 則能看到講習所教育，實際上就如耆老所述，是帶著學生進行農事勞作的實務課程。圖 b 能夠很清晰的辨識出今昔相對空間，種植高麗菜（*tamana*/玉菜）的地方，就是講習所實習園地，這裡能可以看到海端村山界一帶的山坡突角，也可以看到新武呂溪東出花東縱谷寬闊的峽谷，與錦屏部落後方的山嶺；中景建築為「農業講習所」本體。特別值得留意的是，山坡上除了原生林外似乎可見經山田燒墾後的開墾痕跡，顯見即使日本人透過授產企圖改變布農族人的

經濟生活，但直至伊時止，山田旱作仍是族人生活的主要所繫，惟是否仍能踐行與神話裡頭月亮神的約定，舉行一系列圍繞著小米耕作的歲時祭儀，恐怕也難以考證，只能在如《理蕃之友》等警察宣傳刊物，所描述將傳統歲時祭儀活動，整合成神社（祠）前舉行的聯合收穫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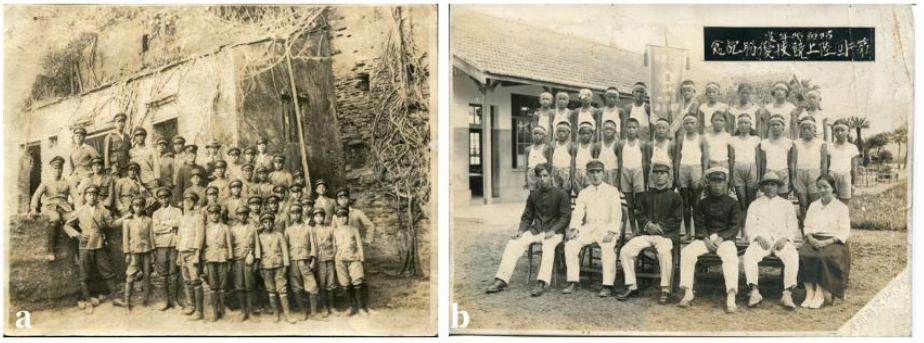


圖 15：公學校的觀光行旅與運動競技

說明：圖 a 推論為 1930-40 年代間；圖 b 則為 1935 年。

資料來源：胡鄭德來授權使用（2025/6/1）。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集團移住」是許多論及日本時代原住民族殖民政策的重要主題，而此一主題背後所涉即為國家對於被統治者身體的規訓，以武力壟斷遷徙自由的權力。另一個比較軟性也隱而未顯的是教育體系下的移動控制。圖 a 是一場修學旅行的紀錄，圖 b 則是一場小學陸上競技（運動會）的紀念寫真，從當代看起來簡直是再日常不過的畫面，但在近百年前的光影反射的卻是極不尋常的社會變革與適應。一來是日本時代以透過「運動會」，展現了身體作為國家規訓的實踐介面，其精神與身體二分，以精神意志主宰身體的意識形態，截然不同於布農人的人觀與身體觀，更與傳統以實用主義、實踐論為核心的教育觀大相徑庭。兩張照片所再現的是「人超越了原本日常生活的範圍，進行了遠地的旅行或競技比賽」，透過身體的移動與更寬廣的世界互動。圖 a 看起來是穿著國民服的布農少年們，在老師的帶領下來到了一個頹圮且長滿樹根的紅磚城牆－筆者認為可能是重要的國家史蹟「安平古堡」；圖 b 則是里壠支廳的公學校參與昭和 10 年（1935）「陸上競技會」（運動會），取得優勝的紀念寫真，男女學童穿著著運動服，後排左三的男童似乎還盡力過了頭，眼睛受了傷還是要挺胸抬頭充滿元氣的望向鏡頭。在此教育過程裡，正如國家可以施加其暴力特權，重新編排人群的單位組成，如集團移住一般，也能在教育現場裡頭把學生帶出去，去看

一個更寬廣、奇異的「世界」，國家往往想像山區居民是困守在自己的小格局中，卻忽略了以往山間高地大跨距自由移動的歷史，此一困守實肇因於國家的封鎖、制壓與監控。這或許是培植國民性的基礎，藉由理蕃的執行者安排了與遠地不同人群、地方的互動，能閱讀報紙出版品之前，便植入了想像的共同體。

圖 16：跨地域組團的臺灣神社參拜

說明：推論應為 1935 年以降。

資料來源：胡鄭德來授權使用（2025/6/1）。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另一種更儀式化的遠地旅行，莫非圖 16 的「臺灣神社參拜」莫屬了，這即使在同一時代的非原住民族地區也相當常見。不過在這一組照片裡頭，卻展現出新國民性架構下「高砂族」的族群化現象，滲透了原本的族群邊界。兩張照片都打破了原本涇渭分明的族群、部落邊界，以臺東廳「蕃地」為單元被編排向殖民地最高精神序列的臺灣神社朝拜。圖 a 裡頭，有男性及女性青年穿著著國民服站在裡頭，其中好幾位戴了善行臂章；第二排站立者右七的女性長者甚至佩戴了頭目章，最後一排右一的男子也同時佩戴了頭目章與理蕃善行章[21]，在在都顯示了這一個跨社、跨地域，或跨族群的人群組成。圖 b 則可能是全屬於里壠支廳下的布農族人，新武呂溪流域

[21] 「頭目章」是依昭和 7 年（1932）12 月 27 日所頒布，總督府訓令第 84 號《頭目章規程》頒發，該規程定義「頭目」係統領「蕃社」之長，除需有眾望及實力外，更重要是由官方所認定。官方造冊列管，具頭目身份者進出官廳公會需佩戴之。「理蕃善行章」，則依同時頒布的訓令第 83 號《理蕃善行章授予規程》授予，獲獎者是由官方所選定的楷模人物，指能夠配合：習俗改善、產業開發、教育普及等理蕃事業成效卓著者，造冊後於「紀元節」（戰前 x 日本開國紀念日，2 月 11 日）與表彰狀同頒發，當出席官方場合時應佩戴。

及內本鹿地方的人都有。以武力推進警備線，警察機關設施形成密集的監視與制壓網絡，翦除危及其治理秩序的威脅者後，透過地方警察、頭人領袖形塑了新的社會秩序，集團移住政策的施行編制新的人群單元；又以一套新的階序符號系統「徽章」來抽象化展現殖民者可識別的領袖頭人，與新培植服膺其「理蕃」改造的新領袖菁英。第二期殖民治理工程裡，日方對於經濟結構、社會結構與意識形態結構，開啟了社會全面性壟斷同化的濫觴，打破了既有的社會範圍，再建構出一條通往貫徹「國民性」為最終目的之道路，在昭和 12 年（1937）踏入戰時體制後，愈趨於明顯。

二、青年團裡的「先覺者」身影

自內地延長主義始，日本內地暢行的青年團組織以社會教育的一環，也進入到殖民地臺灣。包括推廣「國語」的夜學會等教育補習機構，開始出現在臺灣各地；而相當於漢人地方社會保甲制度的「自助會」，也成為部落集體動員的單元。

國立臺灣圖書館

圖 17：部落女青年團組織

說明：推論為 1930 至 1940 年代間。

資料來源：胡鄭德來授權使用（2025/6/1）。

圖 17 是一組相較於充斥青春陽剛血性的青年團，或其他以男性為主的公共事務社團組織，較為罕見呈現女性力量的婦人會或女子青年團。圖 a 前排左四穿著典雅和服的婦女，可能是駐地日籍主官的妻子，至於其他女性也多穿著了精緻的洋裁服飾，且布料各不相同。圖 b 的場合雖然同樣不明，但也是以女青年為主的聚集。《理蕃之友》昭和 17 年（1942）3 月

號所刊載，由筆名「楷生」撰寫的〈理蕃雜感〉，宣傳了關山郡ブルブル社女子青年團（Bulbul/霧鹿）

> 團長是原田朝子，副團長是山本春子，兩位是表姊妹的關係，是非常純樸的模範青年。積極於團員的皇民訓練工作，致力於國防獻金、遺族慰問、勤行楷模等，他們的父親也是相當優秀的壯年人，可以說是令人感動的家族…因為有好的指導者與與好幹部打造出來好的團風，也就是有好的氛圍所致，才有猶如少女莎韻完全實行的忠孝與報恩之情。

伊時已改為日本式姓名的「山本」是當代霧鹿 Takiludun（古）家的先人，報導中簡短的文字，描述女子青年團的職責，雖不需負擔戰鬥的責任，但仍在戰爭時期擔負了皇民後備的工作，還特別描述了其父執輩的順從，與家族作為楷模的樣貌，這在前一個世代前是難以想像的變動。而在這一篇報導中，作者是藉 Bulbul 社（霧鹿）女青年團及其家族，表達「指導者」的重要性，強調即使是從教育所畢業出來，如果指導者沒有辦法在地方形成「風氣」，可能會讓這些先覺者在堅固的社會慣習裡「幹勁全消」，可以說是趁著「莎韻之鐘」的風行，以女子青年團為題，強調指導者與社會改良、國民精神發揚的關聯性。

昭和 13 年（1938）《理蕃之友》二月號，有篇短訊〈大受喜愛的內地式蔬菜料理〉[22]寫著設有「指導農園」新武呂溪上游最深處的 Litu 社（利稻），由警察妻子為老師，運用指導農園所生產的蔬菜，召開了料理廚藝的工作坊，頗受歡迎；由此可見，地方基層的駐在所裡的女性眷屬，也需要擔負女性視角而來的「理蕃」工作，比如藉由指導農園的菜蔬作為料理，讓農園種植成為有實際效果的工作；同一份月刊昭和 15 年（1940）9 月號〈關山郡的家事裁縫講習會〉[23]，紀錄了 Haitutuan 社（海端）的「豊里女子青年團」所參與，關山郡辦理連續五日的家事裁縫講習會，以集體於教育所合宿的形式，進行裁縫機使用與各類家事衛生的講習與實作課程，或許圖 a 正是類似的課程結業紀念。這類由生活滲入的殖民「教化」或許較

[22] 伊集院生，〈內地式野菜料理を喜ぶ〉，《理蕃の友》，第七年二月號（1938 年 2 月），11。

[23] 不著撰人，〈關山郡の家事裁縫講習會〉，《理蕃の友》，第九年九月號（1940.9）：7。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政策上的訓誡，具有深遠的影響力，如筆者在日常生活裡頭常聽到的幾個布農語詞彙，比如 *hailazu*（櫥櫃）、*hasi*（筷子）、*tamana*（高麗菜）、*tamangu*（雞蛋）、*avula*（沙拉油）、*cinpula*（甜不辣）、*yakisoba*（炒麵）、*kistanai*（骯髒）、*baiking*（病毒）、*sikin*（肥皂）、*takai*（昂貴）/ *iiasui*（便宜）等等，都是日語布農化外來詞，而這些語彙構築出來的情境，是一個非常日本化、家政化的生活氛圍，並且傳承留用到了當代的布農社會。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圖 18：勤行報國隊訓練寫真

說明：推論為 1940 至 1941 年間。

資料來源：胡鄭德來授權使用（2025/6/1）。

青年團形式的組織，實打破了傳統布農社會動組織，無論是獵團、遷徙或戰鬥，多以具有地緣因素的氏族（*siduh*）為單位，連結友好的夥伴（*kaviaz*）與姻親（*mavala*），過往採分水嶺或溪溝為界，是具有系統邏輯性的氏族聚落（asang/聚集停留的所在）空間分佈。然而，日本人的介入，以警備系統、集團移住逐步改編空間單元，把駐在所監視區作為單位的青年團，實整合了範圍內的氏族聚落，例如內本鹿地區的常盤青年團，就包括了 Padan、Kaidisahan、Suntik 等部落青年。而青年團與青年團之間，又以支廳/郡、廳等不同的層級，與其他地區或族群的青年整練再一起，形成了前所未見的風景。一如《理蕃之友》昭和 12 年（1937）6 月份的報導〈布農族的今昔〉[24]，一位阿美族青年來到內本鹿的紅葉溫泉療養，與當地的

[24] 不著撰人，〈ブヌン族の今昔物語〉，《理蕃の友》，第六年七月號（1932 年 6

布農族促膝長談，兩人忽然想起這樣的友好，在 20 年前根本無法想像，而立志為了「一起成為真正的日本人[25]」而努力；換言之，日本帝國所建立殖民地族群政治，終於在戰時體制下向統治者心目中標準的帝國臣民「高砂族」形象邁進，而那一個圖像，可藉由圖 18 這張由由臺東東洋寫真館沖印的「勤行報國隊紀念寫真」表達，表象上跨越了地域、族群、文化邊界，台灣人共同以此身份成為帝國戰爭預備隊的一員。

三、成為高砂戰士：太平洋戰爭出陣紀念寫真

戰爭開打時，如何設定殖民地人民（包括朝鮮等）於皇軍陣營的地位？是帝國政府進入戰時體制的重要課題。其根本命題在於，所謂帝國：是專屬於大和民族的帝國，或是包含殖民地人民在內的帝國？昭和 12 年（1937）開始有各種開往戰區的「報國隊」隊伍，比如拓南農業戰士團、工業團等，將殖民地青年輸出前線，擔任戰地糧食生產的農夫、建築工人等準軍事目的的支援勤務。「勤行報國青年隊」便是這樣的訓練隊伍，根據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所發行的《臺灣總督府勤行報國青年隊要覽》（1942），其設立的目的便是透過「勤勞奉仕」的生活訓練體認到日本「減私奉公」的精髓，在以期於身心的鍛鍊下達到成為「皇國臣民的資質」。「皇紀 2600 年」（1940），於臺灣的高雄、臺中、臺北與花蓮港四地開設了訓練所，其訓練科目包括了行事儀禮（早晚的神前行事與明治天皇御制/詩文的吟詠等）、國民精神教育、學科（國語、歷史、地理、職業科）、戰鬥教練與體操（普通體操、木劍、角力）、勤勞作業（勞動建設）等；而其中的「勤勞作業」則是動員作地方基礎建設，例如：昭和 17 年（1942）的花蓮港訓練所，負責的就是開闢橫斷中央山脈的能高越嶺道路工程。訓練生的資格須符合 18 歲至 22 歲的年齡區間，具有國民學校初等科修業完成（原住民族地區另計），由地方行政長官推薦選派青年團長加入。也就是說，青年隊的組成打破地區與族群，透過嚴酷且壓縮為期三個月的共同訓練，建立了彼此相濡以沫的情感，結訓後編為青年隊在鄉隊員，持續推動地方的皇民化運動，而當「特別志願兵」制度實施後，這些曾參與報國隊的學員更前仆後繼地投入徵選，希望能夠通過徵選加入陸軍或海軍特別志願兵行列。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月），11。

[25] 不過讀者仍然要辯證式的意識《理蕃之友》作為警察主管機關刊物本質，是以殖民者角度的宣傳通訊，需批判性的理解文字表象背後可供詮釋的空間。

雖然臺灣軍司令部下達的戰時體制，始自日中開戰後的昭和 12 年（1937），但直到昭和 13 年（1938）2 月敕令 95 號陸軍特別志願兵令下達，殖民地居民才開始可以透過「志願兵」方式正式進入日本軍隊，在此之前則有以軍伕隊身份共 850 員進入中國華中戰場（1937.9.7），參與了淞滬與武漢會戰。臺灣在昭和 17 年（1942）與 18 年（1943）開始招募陸軍與海軍特別志願兵，過程當中雖因教育所與公學校在學程上的差異，可能導致資格不符，但考量高砂族優異的戰鬥技巧與相對於華人的忠誠度，特別於高砂族地區徵募特別志願兵，編成後運輸至各戰地，1942-1943 年間共計派隊出征七次，戰場廣及菲律賓、新幾內亞等地；原本於 1945 年尚有第八次，惟因南向航路受阻而滯留臺灣擔任防守。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表 2：歷次派遣高砂族特別志願兵隊彙整

回次	出發時	軍種	備考
挺身報國隊	1942.3	陸軍	3 月由高雄出發，登陸菲律賓呂宋島，參與巴丹半島戰役，進軍科雷希多島（Corregidor），逼退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戰役後多數引揚回臺，而高雄州出身者百人會同來自花蓮港及臺東廳的補充兵，加入南海支隊，由馬尼拉出發前往民答那峨島，配屬於獨立工兵第十五連隊（橫山大隊）；待支援摩斯比港戰役後九死一生而歸。
第二回	1942.7	海陸	6 月募集後，7 月便自高雄出港，經拉包爾海軍基地於新幾內亞東海岸上陸，加入南海支隊的摩斯比港戰役。（Port Moresby 為 PNG 首都，日本發動珊瑚海戰役後希望由此侵入澳洲）
第三回	1942.10	陸軍	自高雄港出發參與索羅門群島戰役，於新幾內亞東部擔任運搬任務，返回ホーランジャー沖（舊稱 Hollandia /印尼巴布亞省首府 Jayapura 外海）時，運輸艦遭爆擊，近乎全員死亡。
第四回	1943.3	海軍	3 月出發於帛琉進行戰地訓練，後向新幾內亞東部威瓦克等地移動，駐紮ボウキョウ島（望鄉）。
第五回	1943.4	陸軍	4 月自高雄出發，加入第 27 野戰貨物廠，於馬尼拉轉往帛琉停泊三個月後，前往新幾內亞東部，配屬於馬當（Madang）野戰貨物廠，並接受游擊隊訓練。
第六回	1943.6	海軍	3 月加入海軍特別陸戰隊於台中進行三個月的空降暨游擊訓練，6 月自高雄出征。與日本本土兵士會合後，經馬尼拉、帛琉向新幾內亞新不列顛島的拉包爾（Rabaul）基地進發。部分於拉包爾待機，其餘分往新幾內亞與索羅門的布干維爾島戰線；戰後於 1946 年遣送回基隆。
第七回	1944.7	海軍	目前資料不詳；可能前往新幾內亞威瓦克地區。

回次	出發時	軍種	備考
薰空挺隊	1944.5	--	薰空挺隊隊員自特別志願兵裡挑選，於新竹湖口基地進行游擊戰訓練。5.28 由高雄出發，在呂宋島進行最後的空特訓練，並於第四航空軍指揮下於 11 月突襲雷伊泰島機場。
第八回	1945.?		訓練期間南向航路俱斷，轉為臺灣防衛。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林えいだい編（1995）。

圖 19：武德殿前關山郡高砂義勇隊員

說明：拍攝於 1943 年。

資料來源：胡鄭德來授權使用（2025/6/1）。

圖 19 是昭和 18 年（1943）自 4 月 22 日至 5 月 1 日間，由關山郡所派遣參與高砂義勇隊的紀念攝影。畫面第二排坐著的是關山郡警察課的警察官，右三（正中央）為時任警察課課長的小林正樹警部，而已率領過第一回出戰歸來的巡查平山江一郎(鄭江水)，則坐在左二之位。而此一地點，則為關山郡的「演武場」(武德殿)。由這張照片的見證與後頭的文字推論，高砂義勇隊的派遣，應由警察課理蕃部門徵選，經過短時間的組織訓練後，送往高砂義勇隊的訓練所進行更進一步的編組與戰鬥訓練，或直接由高雄出港。

據家族後裔指出，鄭江水曾帶隊前往南洋打戰兩次，經過仔細的蒐集驗證資料後，終於在昭和 17 年（1942）6 月份由警務局特派記者中村文治

在《臺灣警察時報》所撰寫菲律賓戰地的報導〈南方に戰ふ高砂族〉，找到了他的身影。中村所訪問的，正是日後被稱為第一回高砂義勇隊的「挺身報國隊」，他們在該年度 3 月自高雄港出發，由菲律賓呂宋灣上陸，並於馬尼拉北方的聖費爾南多（San Fernando）掛階授槍，報導中隱匿了接下來的日期，指出挺身報國隊參與了馬尼拉外圍巴丹半島（Bataan Peninsula）的總攻擊戰。

平山江一郎[26]當時以第二中隊第二小隊隊付（副隊長）的身份，共同率領三個分隊於呂宋島的巴丹半島等地作戰，而這個中隊則以臺東廳與高雄州的「高砂族」編成。報導中還指出在 OO 月 OO 日時，臺東來的小隊則被派駐於某某師團第一野戰醫院駐守，隨後更參與科雷希多島（Corregidor）的登陸戰。在這一回的派遣中，部分成員還參與了民答那峨島（Mindanao）的作戰，戰後有些隊員則編入工兵部隊到碧瑤（Baguio）去，多數隊員則能夠順利回到臺灣。時值太平洋戰爭初期的勢如破竹，相較於日後派遣軍而言可稱得上是凱旋歸來，也由於挺身報國隊在此戰役的優異表現，報載便改採「高砂義勇隊」表明其作為帝國赤誠兵士的決心。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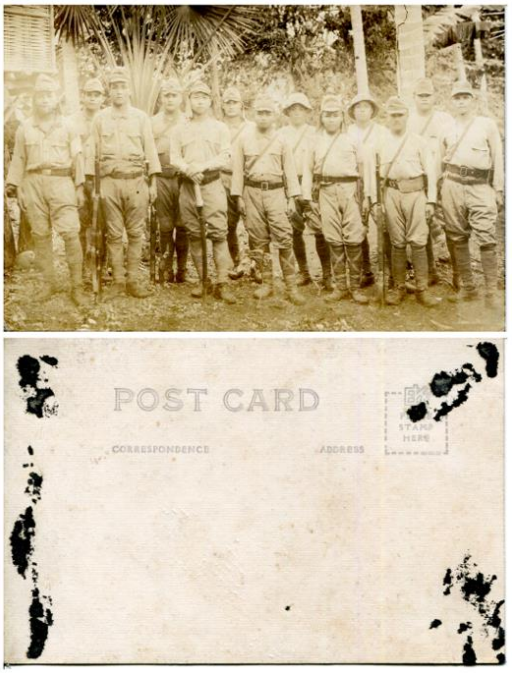


圖 20：由菲律賓戰地帶回來的寫真明信片

[26] 鄭江水於同年因出征緣故，變更氏名為平山江一郎。

說明：推論為 1942 年。

資料來源：胡鄭德來授權使用（2025/6/1）。

在圖 20 的相片式明信片當中，經過考證，為挺身報國隊所前往的菲律賓戰地。畫面當中，平山副隊長與他的小隊成員合影，俱是非常熟悉的臺東與高雄地區原住民輪廓。他們所著為陸軍輕便服裝，頭戴因應熱帶地區的軍用略帽，上衣為軍用襦袢（じゅばん），依形制該為昭和 3 年定（1928）或昭和 11 年式改（1936）；鄭江水的左手臂有值星袖套，是戰場上辨明幹部身份所用，除軍刀還配有手槍，都符合其所擔任的領導職。根據黑澤隆朝（1943）的「臺灣民族音樂調查」採集日記，當時已由菲律賓戰地回到臺灣的平山氏曾向其提到，由於跟布農族皆屬於南島語族的一份子，他才到菲律賓大約二週就能夠聽懂當地的 Bisaya 語，一如在臺東一樣，以其長才協助各方口譯交流溝通。雖然目前尚無跡證顯示鄭江水的第二次出征，但確切的是他後續仍持續參與關山郡派下高砂義勇隊的送行留影，隨著戰局的不斷潰縮，這一系列影像見證了關山郡範圍內的原住民族所遭逢戰火苦難，家族的不捨。

國立臺灣圖書館

圖 21：第六回高砂義勇隊紀念攝影

說明：1943 年拍攝。

資料來源：胡鄭德來授權使用（2025/6/1）。

圖 21 為昭和 18 年（1943）的第六回高砂義勇隊，根據林えいだい（1995, 1998）的研究，來自全臺各地的第六回高砂義勇隊，3 月份在臺中接受海軍陸戰隊的空降訓練，6 月份由高雄出港前往新幾內亞的拉包爾基地（Rabaul），分往新幾內亞與索羅門北部的 Bougainville 戰線，戰後於 1946 年才遣送回基隆。由此，比對相片上的拍攝日期，如果是在鄉的出征儀式

紀念，與林氏的說法有些時間差，可能需更近一步的檔案資料佐證。兩張構圖都是標準正面合照，但場面調度語言頗有不同：圖 a 是警察課前所拍攝，包括郡守與警察課主管以降中高階警察官、在勤巡查等都齊聚一堂，部隊長位於郡守金原幸三與課長小林正樹之間，是畫面的核心，其餘 26 員則站立於畫面後方，不過另有一名隊員手持國旗坐在前排右一，可能是隊伍中的幹部。平山江一郎（鄭江水）則站在最後一排的右六，仍未穿著正式掛階的警察制服，顯見其特別的份量位置。圖 b 則是出身里壠山社（今崁頂部落）的隊員，眾人在部落為其舉辦的入伍送別會，年輕而青澀的當事人手持國旗坐在第一排的主位，右側為該監視區主管的巡查部長，坐在前排右五的是平山江一郎（鄭江水），此時身穿完整的警察制服，掛巡查階，坐在他旁邊的則是里壠山社頭目。在這張相片族人們的表情語言複雜，特別是女性充滿著不捨及擔憂的神情。位於里壠山國語傳習所前，成為了日本時代卑南溪流域布農族人，經歷了國家可視化、去地方化及再地方化的最終的見證。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伍、結論：見證光影，逆讀困難歷史

本文結合家族史與文本歷史考證，以及歷史影像解析的研究，勾勒了卑南溪流域布農族地區南部的歷史，並試圖呼應更寬廣的臺灣原住民族近代史。時間軸由西元 1880 年大致延伸到 1945 年代二次大戰終戰前。鄭氏家族由中國福建渡臺，輾轉於多元族群匯聚的高雄荖濃溪上游六龜里落戶，他們就居住在部落裡頭，成為部落和外界貿易交換的管道，提供促進聲望的槍枝，也成為傳統領袖聯姻
婚配的對象，化為了布農社會的一份子。隨著現代國家體系的移入，漢人「通事」介乎曖昧的反抗與和解抉擇之間，成為新政權設法取得掌控的對象，而本文主角鄭江水之父「鄭森」也由「通事」變成「警手」，家族仍然作為區域關鍵的代理人/中介者角色。

卑南溪流域布農族地區，在西元 1920-1930 年代間經歷第一階段的國家治理秩序建制歷程，由中央山脈的自由人，成為特別行政區建置下的「非公民」。本文所解析的家族/地方史與歷史影像，則回應了第二階段治理秩序（1930-1945）的深化及穩固：身體、空間與移動的編排與規訓，是這個時期國家治理術的重心。當第一階段國家，以現代化軍事武力迫使自由遷徙流動的南島游耕社群，固著於特定地理區位，再透過「集團移住」的方

法，重新編組其統治者的單元，「蕃界」曾猶如一無形的城牆，不讓人隨意進去，裡頭的人也無法自由的出來。

隨著治理網絡主宰性的強化，以「駐在所」為核心開展的殖民社會生活，陸續成立了國語的普及會、夜學會、教育所、青年團，增加新的社會生活範疇；而這些社團得以與更大範圍的地區、族群整合在一起比序，比如臺東廳的國語競技、牛車耕作的比賽、青年團的軍事技能校閱等。部落與外界再結構化的速率越來越快，原本部落裡頭的 *bananaz*（男人），變成駐在所列管的青年團成員，又成為代表臺東廳的勤行報國青年隊隊員，最終在 1940 年代中葉的太平洋戰爭體制下，轉身為帝國兵隊裡的附隨者，與其他地方的人於大洋洲裡遙遠小島的密林間生死與共。「國語」超越原有地方、族群的文化邊界，以政治性想像的共同體－「高砂族」輪廓更為深化且立體。

本文藉由歷史・記憶人類學方法解析這一批警察公務影像，嘗試以逆向的角度理解原為殖民者的影像立場，借助影像可視化的特性，見證 20 世紀初臺灣的「南島語系族群」（文化性、本真性、主體性）成為「高砂族」（政治性、建構性、客體性）的歷史過程；同時也更立體的展現殖民地警察官僚的勤務實況，包括以「巡視」為主題的殖民地威儀展示的前台，及「慰問」作為殖民地官僚內部調適的後台。與戰爭時期，作為基層動員的監督者與執行者的勤務實況。對於原住民族而言，這些影像誠然是傳統社會結構、法理、世界觀於近現代被迫裂解的開端，殖民影響帶來的破壞力更延續到戰後長期的「山地平地化」政策，凝結為一段難以凝視的困難歷史（difficult history），然而這些影像也好比凝結於時光間的膠囊，得以藉由綜合性的解析方法（歷史文本、口述記憶、系譜學、影像後製-AI 輔助修復）探索它所存在的時空背景，方能藉由過去理解當代處境之始源，開展邁向未來的歷史正義修復修行。

國家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徵引文獻

一、中文參考文獻

石丸雅邦，〈從「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看理蕃警察通譯兼掌制度〉，《第六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1，263-298。

林一宏，〈國立臺灣博物館藏三吋速射野戰砲之考證〉，臺灣博物第 142 卷第 38 期（2019），48-55。

吳易叡，〈The Missionary Gaze: The Social Biography and Archiving of Dr. David Landsborough IV's Photographic Collection.〉，《臺灣人類學刊》第 10 卷第 2 期（2012），01-57。

胡家瑜，〈文化調查、標本收藏與攝影：十九世紀中葉起的台灣調查採集動力與歷史脈絡〉，《Voices of Photography 攝影之聲》29（2020[2006]），2-15。

黑澤隆朝原著、王櫻芬主編、王櫻芬、劉麟玉、許夏珮譯註，《臺灣高砂族之音樂》。臺北市：南天書局：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音樂館，2019。

森丑之助原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 ： 森丑之助的臺灣探險》。臺北市：遠流出版，2000。

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教室調查、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臺北：南天書局，2011-2012。

謝博剛，〈中介著的視點：卑南溪流域布農族地區近代社會影像誌(1880-1950)及博物館再現〉。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2022。

二、日文參考文獻

毛利之俊，《東臺灣展望》。臺東：東臺灣曉聲會，1933。

中村文治，〈比島雜感〉，《臺灣警察時報》6 月號，1942a。

中村文治，〈南方に戰ふ高砂族〉，《臺灣警察時報》6 月號，1942b。

林えいだい，《台湾植民地統治史：山地原住民と霧社事件・高砂義勇隊》。福岡市：梓書院，1995。

湯浅浩史，《瀨川孝吉臺灣原住民族影像誌－布農族篇》。臺北市：南天書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局，2009。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志田梅太郎任府技手ノ件〉，《明治四十四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判)第八卷秘書》，1911a。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數位典藏件號 00001889013。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囑託志田梅太郎昇給、賞與〉，《明治四十四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判)第八卷秘書》，1911b。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數位典藏件號 00001889044。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里壠支廳設置認可（臺東廳）〉，《大正四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二十七卷地方》，1915。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數位典藏件號 00002367011。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冨永藤平任地方理事官、俸給、勤務〉，《昭和五年十月至十二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高等官進退原議》，1930。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數位典藏件號 00010062080X001。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勤行報國青年隊要覽》。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42。
臺灣總督府府報，〈昭和 7 年訓令第 83 號「理蕃善行章授予規程」〉。臺灣總督府報第 1703 期，1932。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數位典藏件號 0071031703a002。
臺灣總督府府報，〈昭和 7 年訓令第 84 號「頭目章規程」〉。臺灣總督府報第 1703 期，1932。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數位典藏件號 0071031703a002。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理蕃誌稿：第一編、第二編》，1918。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理蕃誌稿：第三編》。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21。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理蕃政策大綱》。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1。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理蕃誌稿：第四編》。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2。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理蕃誌稿：第五編》。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8。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高砂族授產年報（昭和 18 年度）》。臺北：臺灣總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督府警務局，1943。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理蕃の友（復刻再版發行）》。東京：綠蔭書房，1993 [1932-1943]。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Whose Gaze: Reinterpreting Police Archive Photos from the Bunun Territory (Taidō-chōw 台東庁, 1920-1945)

Po-kang Hsieh*

Abstract

Images possess a unique semiotic power: they allow viewers to seemingly "witness" a scene firsthand, while simultaneously obscuring the photographer's intentions, the broader context, and the constructed nature of what appears to be documentary truth. This paper draws on Erving Goffman's analysis of performance and the frontstage/backstage distinction to examine a family photo album preserved by the Cheng Chiang-shui family in Taitung. Owing to the family's involvement in Japan's colonial-era "Indigenous Pacification" campaigns and their subsequent role within the postwar state apparatus tasked with enforcing control over Indigenous mountain communities, the album contains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official photographs taken between the 1930s and 1950s. These visual records offer a rare glimpse into the operations of colonial policing in Taiwan's Indigenous territories.

Using methods from historical and memory anthropology and drawing on sources such a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rchives, police documents, privately held records (including manuscripts and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and field visits, this study reconstructs the experiences of the Cheng family, who lived in the Bunun territory of Taiwan's Central Mountain Range. From the late 19th to the mid-20th century, this family navigated relationships with Indigenous communities, Han Chinese settlers, market networks, and state bureaucracies. Through the lens of historical images, this paper further reveals how the "frontstage" of colonial bureaucracy – the performance of official duties – and its "backstage," populated by transient strangers in a militarized zone, shaped the percep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is southeastern highland region, once described as "the last frontier to be governed by the state" or "the last free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 Assistant Researcher Fellow,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Taiwan).

people of the Central Mountains."

Finally, by critically engaging with these visual records, this paper underscores that the study of difficult Indigenous histories is inherently complex, involving multiple actors and layered perspectives. Any postcolonial effort to "write back" to these histories must therefore draw on a diversity of viewpoints, archival sources, and representational forms.

Keywords: Broker, Police, Bunun Peoples,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Visual anthropology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